

How to conduct a scientific analysis of historical events

科学看历史

—如何科学地分析历史事件

Ruiqi Li (李睿琪)¹ and Bertrand M. Roehner²

December 3, 2017

¹School of Systems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Email: lruiqi@mit.edu

²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and High Energy Physics (LPTHE), University Pierre and Marie Curie (UPMC), Paris, France. Email: roehner@lpthe.jussieu.fr

Contents

写在前面的话	7
前言	9
第一部分：关于中美的五个案例分析	21
Chapter 1: 911恐怖袭击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23
1.1 两种描述模式	23
1.2 透视9/11事件	25
1.2.1 对于可能的反对声音的解答	26
1.2.2 只是另一个阴谋论?	27
1.2.3 西方战机曾投放的炸弹和恐怖袭击	27
1.3 如何辨别哪些事件属于同一事件集合?	29
1.3.1 物理学中对于“类似”现象集合的定义	30
1.3.2 为何高信噪比会使得科学分析更复杂	30
Chapter 2: 中美全球领导力竞争	33
2.1 合作还是竞争?	33
2.1.1 两种不同的预测冲突发展的分析方法	33
2.1.2 经典案例	34
2.1.3 西欧国家间的冲突	35
2.1.4 一个新旧霸权交替的特例	35
2.2 经济合作还是竞争?	36
2.2.1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启示	36
2.2.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	37
2.2.3 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主要储备货币	39
2.3 中国经济的发展	39
2.3.1 GDP的增长	39
2.3.2 对外贸易	41
2.3.3 人民币在债券市场中的角色	41
2.3.4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	41
2.4 协同浪潮	42
2.4.1 产品协同以及快速的物流	42
2.4.2 产品协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42
2.4.3 中国近年来的技术突破	43
Chapter 3: 国家激活	45
3.1 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	45
3.1.1 清朝前期的版图扩张	45

3.1.2	清朝后期的版图缩小	46
3.1.3	国外势力的急剧变化	46
3.2	国家激活	47
3.2.1	广泛的信仰认同和增长的群众基础	48
3.2.2	人口增长	48
3.2.3	教育的普及	49
3.2.4	交互浪潮	49
3.2.5	经济飞速发展	51
3.2.6	有效的武装力量	52
3.3	国家激活案例的比较	54
3.3.1	广泛的信仰认同和增长的群众基础	54
3.3.2	自由帽的反复出现	55
3.4	小结	56
3.4.1	中国文学是否处于激活状态?	56
3.4.2	历史学家倾向于研究单体问题	56
Chapter 4: 丝绸之路倡议与遏制政策		59
4.1	比较视角下的丝绸之路倡议	59
4.1.1	马歇尔计划与丝绸之路的比较	60
4.1.2	与丝绸之路相似的三个案例	61
4.1.3	欧洲错过的基础设施建设机会	61
4.1.4	丝绸之路面临的重大挑战: 跨越语言障碍	61
4.2	遏制政策	61
4.2.1	通过军事行动来获得影响力并培植盟友	62
4.2.2	构建遏制网络	66
4.3	两种不同的模式可能会产生怎样的相互作用?	67
4.3.1	古阿姆民主与发展组织	69
4.3.2	在非洲的竞争	69
Chapter 5: “视太平洋为美国内湖”		75
5.1	美国称霸太平洋地区之源起	76
5.1.1	殖民夏威夷	76
5.1.2	开采鸟粪石(1840-)	76
5.1.3	兼并菲律宾、关岛和波多黎各(1898)	77
5.1.4	太平洋战争(1941-1945)	77
5.2	对美国太平洋霸权地位的挑战	77
5.2.1	二十世纪初: 沙俄帝国	77
5.2.2	20世纪40年代: 日本	77
5.2.3	中国	78
5.3	美国如何说服日本与俄国开战	82
5.3.1	背景	82
5.3.2	日俄战争大事记	82
5.3.3	日本对和平条约的反应	87
5.3.4	塔夫脱太平洋外交任务	88
5.3.5	小结	89
5.4	美国如何鼓动其盟友对抗中国?	90
5.4.1	法国	90

5.4.2	日本	91
5.4.3	菲律宾	92
Chapter 6:	可验证的预测	95
6.1	什么样的预测?	95
6.1.1	比较历史分析学并非占星术	95
6.1.2	未来的不确定性	95
6.1.3	真正重要的是预测须要是可验证的	96
6.2	间接的军事对抗	96
6.2.1	1920-1936年间苏联与美国及其盟友在中国南部的间接对抗	96
6.2.2	美俄间接对抗	97
6.2.3	发生在泰国的间接对抗	98
6.3	丝绸之路倡议面临的挑战	99
6.3.1	瓜达尔案例	100
6.4	信息战	101
6.4.1	应当怎样理解“信息战”?	101
6.4.2	南奥塞梯事件	102
6.4.3	中国对西方企业的收购	102
6.4.4	反共产主义如何塑造美国媒体	104
6.4.5	西方政府进行的媒体监管	104
6.4.6	谁将赢得信息战	106
6.4.7	媒体在日本的作用	106
6.5	结论	107
	第二部分: 概念与方法	109
Chapter 7:	比较历史分析学: 历史学与社会学之合璧	111
7.1	因为简单而非因为重要	112
7.1.1	没那么简单的实验	112
7.1.2	简单性: 人类思维的基本要求之一	113
7.1.3	现象学方法的局限性	114
7.1.4	历史学中的模块化方法	115
7.1.5	应用	116
7.2	历史社会学的比较方法	120
7.2.1	关于比较性研究方法的争论	121
7.2.2	寻找模式和行为策略集	121
7.2.3	“为什么”与“怎么样”	122
7.2.4	弥合宏观与微观社会学的差异	123
7.2.5	发展比较分析方法的障碍	123
7.3	昨天是明天的最佳预言	124
7.3.1	同源性、模仿、行为策略集	125
7.3.2	历史类比的运用与滥用	131
7.3.3	历史在何种程度上是不断重复发生的?	134
7.4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143
7.4.1	自然科学的实验真的可以完全重现吗?	143
7.4.2	米尔的经典逻辑	144
7.4.3	历史分析学和人类自由	145
7.4.4	不可预测问题和混沌	146

7.4.5	进步的必要条件: 获得可靠数据	147
7.5	总结及《历史中的模式与行为策略集》简介	148
7.5.1	模块的确定	149
7.5.2	后续案例研究小结	149
7.5.3	撰写比较历史时会遇到的问题	153
	第三部分: 结语	155
	Chapter 8: 还要做什么?	157
8.1	物理学与天体物理学为何能取得巨大的成就?	157
8.1.1	希腊在科学上的突破以及随后欧洲长期的停滞	157
8.1.2	以简单性为指导方针	158
8.1.3	物理学研究的集体性与可累积性特点	158
8.2	将社会科学转变为可累积的学科	159
	参考文献	163

写在前面的话

写作本书有两大目标，第一是展现比较历史分析学(comparative analytical history)这一全新概念，我们之所以说它是科学的，是因为它首先是基于多个事件的对比研究而非对于特定事件的描述或记录，同时关注于“简单”问题而非“复杂”问题、关注于“小”问题而非“大”问题，从构成大问题的大量小问题当中发现规律并进一步得出可验证的预测(testable predictions)；第二则是希望能为将历史学转变为真正的科学尽一份绵薄之力。无须多言，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转变难以一蹴而就，前路也必是道阻且长，因而更须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天文学(astronomy)用了数百年才真正发展为科学，相似地，比较历史分析学也会须要数十年来真正完成其概念与理论体系的建立。望有志之士能够投身于这样的研究工作，若能视兹如兴趣爱好用闲暇之时进行研究或亦能有所成。我们提出如此倡议亦是受诸多非商用的开源计算机系统与程序(例如Linux操作系统和Python)开发过程之启示。我们可以为有兴趣推动比较历史分析学的参与者提供一些微薄的经费支持，无论您从事何种职业(无论是天体物理学家还是记者、作家或其他行业)也无论退休与否，只要您认为比较历史分析学这一方法有潜在价值并对参与这样的研究有兴趣，都可以联系我们。

由于本书是基于类似事件的对比分析研究，所以往往会涉及众多发生在不同国家的相似的历史事件，许多发生在国外的事件或许相对不为人所熟知，同时又由于篇幅有限，我们无法对每个历史事件都进行非常详细的介绍，所以当读者对某些事件不够熟悉但又想要深入了解时，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参照各种语言的维基百科或相应参考文献(本书中的参考文献均以“作者姓氏 年份”这样的格式出现，在书后的参考文献列表中可根据作者姓氏的字母序索引找到相应的文献)。

本书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案例分析，第二部分是对于所用比较分析方法的介绍，第三部分是对于比较历史分析学未来发展的展望。之所以这样安排也是为了在文本的趣味性与科学性之间找寻一定的平衡，对于小问题的研究科学性会更强但是或许会更加乏味，而大问题则可能更有趣味更为关注。所以在第一部分的案例分析中我们涉及的仍然是一些大问题或相对复杂的问题，我们并不能完全解决甚至无法完全解释它们的方方面面，我们所试图做的是在这些大问题中发现一些对于更简单的小问题并从中发现一定的规律；而第二部分则更加关注于如何从小问题中发现科学规律以及更系统地阐释这些规律的发现对于解释大问题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对于更倾向于了解具体故事以及比较分析方法大致思路的读者，第一部分的案例分析或许更有吸引力；而对于更希望探索比较历史分析学背后的科学概念、图景与方法的读者，第二部分可以作为导入章节。

路漫漫其修远

本书在中国的出版之前，本书著者之一(B.M.R.)在1993年完成本书前身的法语初稿，200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译本(Roehner and Syme 2002)，而现在在中国读者看到的这一版则几乎是一部全新的作品，其内容大量取材于中国历史事例，在方法论和主要的概念上则与前两部作品保持了一致。

从法文初稿到如今的作品，其中的故事似乎颇有更深的意味，因为它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要出版一些全新的研究并非易事；而对于已经出版的书籍而言，要把全新的理念传达给他人亦非易事。

尽管在西方有很多出版商，但要打破学科研究的风尚樊篱和狭隘的思考模式仍然不易。事实也证明在中国找到一个愿意出版新式研究的出版商要比在法国容易得多。

回想1993年法文书稿被推荐给几家出版社的时候，结果始终是被弃置一旁，多数时候是被直接拒绝，因为这本书的主题“不符合我们的出版计划”。可一种新方法、新主张怎么可能符合既存计划呢？抱着英美出版商或许更加开放的希望，在当时执教于牛津大学的合著者托尼·赛姆(Tony Syme)的帮助下将法文书稿转译成了英文。然而当英文稿被推荐给英美的出版商时如潮般涌来的仍是相同的答复；最终在1998年底，本书著者之一(B.M.R.)决定访问美国以期从美国的知名学者当中争取支持。

在此要感谢萨缪尔·威廉姆森教授(Samuel Williamson)邀请前往哈佛大学访问两个月，同期也访问了纽约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其它数所高校。然后奇迹发生了，在应斯坦利·利伯森教授(Stanley Lieberman)之邀在哈佛社会学系作报告之后(1998年9月29日)，恰好有机会与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迈克尔·阿隆索(Michael Aronson)共进午餐，而这开启了随后的一系列事件，促成了四年后《Pattern and Repertoire in History(历史中的模式与行为策略集)》一书的出版。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已故的查尔斯·提利教授(Charles Tilly)的支持，他是该书出版前的评阅人(pre-publication reviewers)之一，他不但建议了这一书名并且对书中内容提出了中肯而宝贵的建议。

本书的部分内容取自《历史中的模式与行为策略集》一书，余下大部为新作，以期在科学性与趣味性上做到兼顾。文本最初由英文写成，中文版的面世有赖于多位译者的辛勤工作，没有他们本书的出版或许还遥遥无期。前言的初稿翻译由武国宇完成，第一章、第四章由徐壬捷完成，第二章由秦朗与刘佩佩完成，第三章、第五章和第六章由刘佩佩完成，第七章由刘佩佩、秦朗、徐壬捷等多人共同完成。

2017年11月23日
于波士顿

前言

从天文学看历史学

写作本书的初衷可以从历史学与天文学(astronomy)及天体物理学(astrophysics)的对比中窥见。

人类在数千年前就已经开始观测天空并记录太阳、月亮、其它行星和恒星以及彗星的位置。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记录都导向了繁复的占星学(astrological)模型；而真正的天文科学只曾在两个地方萌芽：

- 从古利奈人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 of Cyrene, 276BC-195BC)到托勒密(Ptolemy, 100-170)生活的古希腊以及希腊化世界 (参见图1)。
- 在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 1546-1601)、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和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 1643-1727)生活的西方欧洲。1563年第谷¹观测到木星(Jupiter)和土星(Saturn)交会，并发现当时普遍使用的托勒密天文表(Ptolemaian tables)并不准确，这一发现使第谷意识到天文学的进步需要系统、严格的观测(详见图2)；开普勒在1627年(即第谷去世26年后)基于第谷精确的观测发表了后世所称的“鲁道夫星表”(Rudolphine Tables)；牛顿通过论证开普勒定律与引力理论的一致性，证明了地面物体与天体的运动都遵循着相同的自然定律。他们三人共同的努力和研究成果宣告了现代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的开端。

值得一提的是，托勒密(Ptolemy)、第谷乃至开普勒(Kepler)除了在天文学(astronomy)上有重要贡献，他们也都曾在占星术(astrology)方面著书立说。在每一年的年初，第谷都要向丹麦国王呈交一份预测星象对政治和经济前景影响的历书(Almanac)。鉴于占星学被认为比天文学“有用”得多，这种将神人格化的(anthropomorphic)态度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事实上，诸如中华文明、印度文明、玛雅文明以及西方文明都为通过对观察天象来预测地上事物的变化而发展出了繁复的体系。

本书所提出的对历史事件的科学分析是如何可以与天文学的产生及其与占星学的分离所相比拟的呢？随着文字的发明，人类记录下了几千年来历史事件。但重述事实而非表达作者的想法或信仰就成了对于史家的第一个挑战。中国的史官通过对各类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记述跻身于首批进行事实性记

¹第谷不仅身为贵族，而且位列朝臣，他是纯粹出于个人兴趣才被吸引到天文观测中来，他也曾准备放弃丹麦宫廷俸禄优厚的官职来实现他的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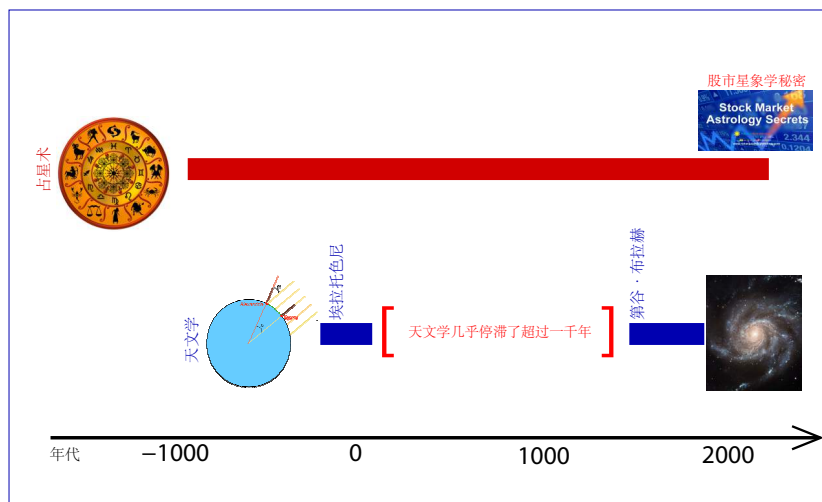


图 1: 占星术和天文学的发展。从历史角度来看, 占星术的出现远早于天文学, 而且它在各大文明中都有发展: 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玛雅文明和波斯文明。占星术虽然并非科学, 但现在仍有许多人相信, 在西方都还有“股市星象学秘密”这样的东西。中间长达千年的停滞是欧洲黑暗时代, 在这期间许多过去的知识被部分地遗忘 (Jacobs 2010)。

附注: 图中左下角的示意图展示了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设计的测量地球半径的精巧实验: 他知道在夏至日那天阳光会直射(阳光会射入赛印城内的一口深井并在井底的水上反映出太阳的倒影)位于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正南(但实则并非正南而是向东偏了一个经度)约920公里外的赛印(Syene, 现今埃及的阿斯旺Aswan), 所以他根据夏至日下午时分亚历山大港一座方尖石塔投下影子的长度推算出两地与地心形成的夹角 $\alpha \approx 7^\circ$, 再根据两地之间的距离便推算出了地球的半径。不过应该注意的是, 在他的计算当中假设了阳光是平行的, 而这一假设成立的条件是太阳离地球非常的远。虽然哥伦布大略知晓埃拉托色尼进行的测量, 但他却错误地解读了当年测量的单位, 不然他一早就知道印度是远在他探险所能触及的范围之外的。

述的学者之列²; 希罗多德(Herodotus, 484BC-425BC)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

²中国最早的史书目前公认的是《尚书》, 它的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 依体例又分为典、谟、训、诰、誓、命。编年体史书《左传》则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 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虽然西方的史家也多为宫廷史官, 但东西方在历史著述方面仍略有差异, 有些西方的事实性历史著作是由亲历者完成, 两个典型的例子便分别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成书于公元前430年)和凯撒大帝的《高卢战争史》(成书于约公元前50年)。修昔底德被后世公认为作家和历史学家, 但他也是参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一位将军; 而凯撒大帝则是当年高卢(今法国)战争的最高指挥官。这类史书所涵盖的时间段通常只有数年(一般少于20年), 但一如古往今来所有由胜利者所书写的史书一般, 许多胜利者的血腥历史都被掩盖或美化, 自然也无法做到全然客观(即便是现今美国国防部所书写的美国军事史亦是如此, 例如他们所写的《Relations between Allied troops and the population of Japan(与盟军部队和日本民众的关系)》在许多事实上都有失偏颇而且倾向于美国)。只是在中国古代, 据我们所知未曾有过像修昔底德和凯撒大帝这样的历史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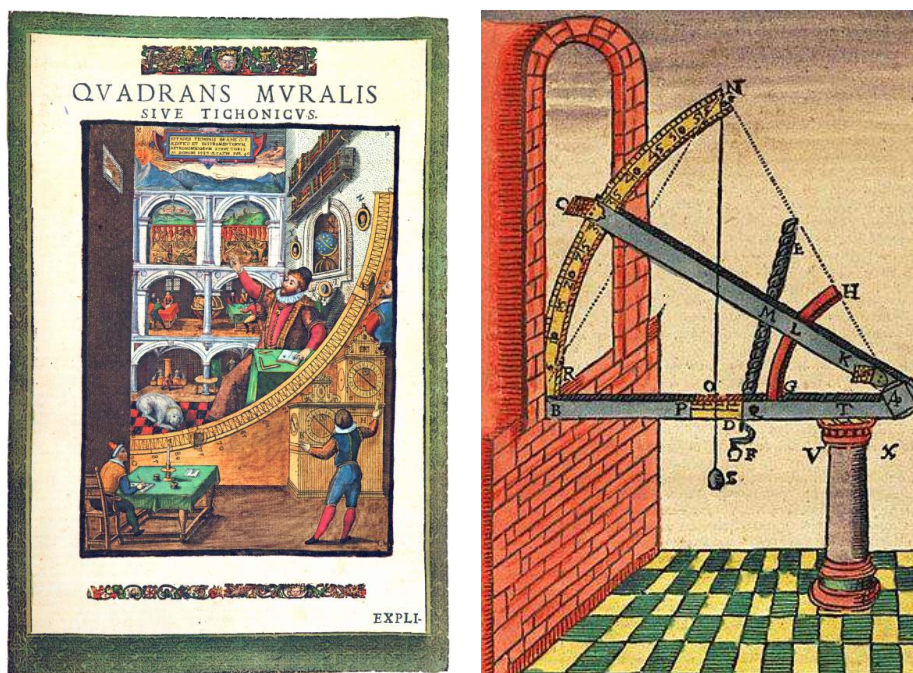


图 2: 第谷·布拉赫发明的两种测量仪器。左边是位于乌兰尼堡(Uraniborg)天文台的墙式象限仪(wall quadrant), 该天文台位于瑞典斯堪尼亚省南部和丹麦之间的汶岛(island of Hven/Ven)。右边则是第谷的超大六分仪。资料来源: 法文维基百科词条《Tycho Brahe(第谷·布拉赫)》

460BC-400BC)则是西方的代表。相反地, 当人们去阅读当代英语作家所写的关于1666年伦敦大火的故事时, 读到的更多的是关于罗马人、圣经和神明的公正, 而非大火这一事件本身。由于从特定事件无从得出“科学”(个例只能被描述), 要实现科学分析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找出相似事件(similar events)的集合(参见3)。

这个想法很容易理解, 一个16世纪的天文学家通过对比相似性极低的金星(Venus)和彗星的轨道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 基本上什么都得不到, 因为客体之间差异太大, 而且彗星的数据往往不够精确, 而这更加导致无法进行有效的比较。但是如果这个天文学家去比较金星和火星(Mars)的轨道, 他就有可能发现我们今天所知的“开普勒定律”(Kepler's laws)。对于社会科学也是如此, 要想得出有效的结论, 我们必须比较被严格定义且具有充分相似性的事件。

这一点也是支撑全书的核心观念, 分析和预测须要基于分类方法(categorization methodology), 当特定现象能够通过为数不多的几个参数进行描述的时候, 上文提到的基于定律(如开普勒定律)的方法往往就很有效。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对于预测钟摆的舞动周期, 人们只要测量它的长度即可。但是对于物理学之外的现象, 其参数的可变性(variability)和数量往往远远超出能够用定律进行预测的要求。对于这类更为复杂的现象, 基于定律的方法必须被扩展为我们所称的分类法(categorization)或归因法(ascription)才能更加有效。让我们用三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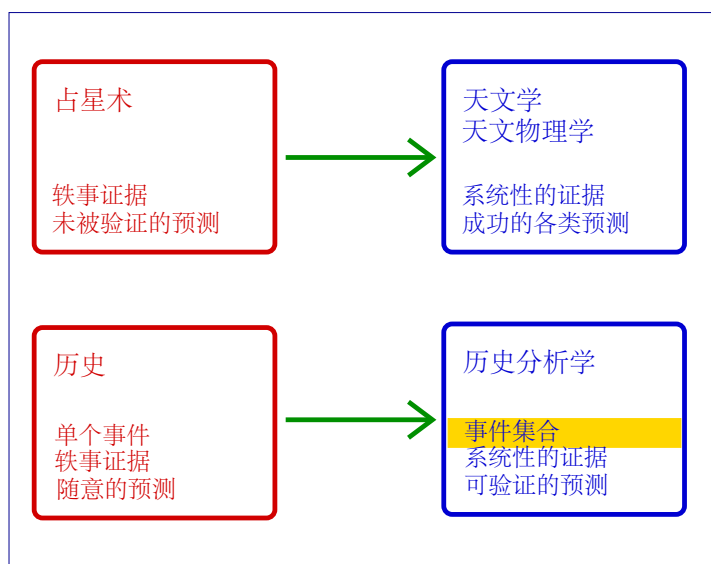


图 3: 向科学方法的转换。从占星术向天文学的转变最早发生在古希腊, 之后发生在十六世纪的西欧。在历史学科学化的转变过程中, 我们认为最基础的是相似事件的集合数据; 虽然帕累托(Pareto 1916)和法国的“年鉴学派(Ecole des Annales)”已经反复强调过这一步骤的重要性, 但目前这一点却鲜被认可, 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一想法在2016年的认可度可能还不如1916年时的情况。

例子来解释这一概念。

- 恒星的演变过程取决于数个参数, 例如恒星的质量、年龄以及颜色。天体物理学家基于这些参数定义了标准化的类型, 对于每个类型的演化时间轴定义地都非常明确。因此当人们想要大致预测一颗新恒星的变化时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确定这颗恒星的类型。
- 同样的方法也应用于医药学领域。医生会基于一系列已观察到的症状来确定一个病例是流感、结核还是肺癌。由于人体系统非常复杂、医学诊断须要涉及非常多的症状、也难免会有一些误判, 但它仍然可以说是分类法的一个成功案例。
- 分类法同样也被应用于物理学中。假定想要预测螺旋桨周围的空气如何流动, 如果通过基本原理[即求解流体力学(hydrodynamics)中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式(Navier-Stokes equations)]来做出判断将会非常复杂; 但相反, 采用分类法却可以很轻松地解决这个问题: 螺旋桨可以根据其形状分成不同类别, 而在每一大类中又可以基于一个描述某参数的索引号(index number)进一步划分为一些子类(sub-classification), 例如曲率(curvature)就是一个子分类参数。举例来说我们会看到以下的类别: NACA 0012、Eppler E 193、Wortman FX 75-141。所以若想对新型螺旋桨的空气动力学进行预测, 只需要确定它属于哪一个大类以及它的

索引号即可。当然，为了保证这一方法的有效性，所有类型的标准螺旋桨都必须经过风洞(wind tunnel)试验；由于螺旋桨会有上百种不同的形状，所以得出这样的分类须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

对于历史事件而言，其可变性相比于恒星、疾病或者螺旋桨还要高很多；而分类工作几乎处于起步阶段，这也是为什么如今的分类法只能在相当基础的层面运用。要取得长远的发展，关键在于确定和定义大量相似事件的集合³。在医疗领域，疾病分类工作用了数个世纪才完成，现今通用的《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10(国际疾病分类, 第十版)》已经涵盖了成千上万个类别。这一先例表明我们必须保持耐心，但更须大力推进历史领域的分类工作。

有效对比之缘起

随着对历史事件的事后认识不断深化，进行精准且有效的对比的理由也变得相当清晰。本书所提出的方法有赖于进行恰当有效比较：既然是进行对比，那必然得是针对某一具体特征或属性，而且为了能使对比合乎情理，所比较的事件必须尽量相近。诚然这在物理实验中更易实现，但在历史分析中我们仍可尽量去找更多的相似事件来进行分析。这一比较方法论最早是由社会学家艾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 1858-1917)引入，本书也会对此做进一步介绍。

然而少有历史学家愿意使用杜尔凯姆提出的比较研究方法(参见图4)，当然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是个例外。此人于1924年发表了一项主题为“皇室之触”(The royal touch)的研究成果，后来该研究被翻译为英文。该研究为我们所指的“严格定义且充分相似的事件比较”提供了绝佳的例证。在法国和英国关于“皇室之触”有这样的说法——即国王可以仅靠触摸病人就治好他所患的疾病。这当然是一个准确定义的现象，不幸的是，这种比较研究仍然相当特殊而孤立。尽管形式尚不够稳定，但比较历史学(comparative history)能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法国盛行，主要归功于马克·布洛克建立的“年鉴学派”(Ecole des Annales)。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无论欧洲抑或美国的历史研究又回到了针对某一国家、某一段时间、某一种现象的个例研究上，例如“对1925-1935年德国失业状况的研究”。

对于这样的话题，人们尽可以讲出有趣的故事，但却无法从中得出任何科学理论；这样的研究无论是否包含经济学模型，都仍然只是停留在了描述层面；而科学需要可验证的预测，要做到这一点，就势必须要分析基于某一效应所对应的多个事例所组成的集合。

实验物理学与观测性的天体物理学的方法论

实验物理学的方法论就是基于比较分析的，例如研究摆的第一步是要测量其的周期，第二步则要重复观察以检验这一现象是否能够重现。接下来我们可以改变一个参数(比如摆的长度)，来观察其周期受到怎样的影响。这也正是我们希望研究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所采取的研究步骤。

³举个粗略的例子来说，若想用分类法研究农民起义，可以先根据其起因进行一个大类的划分，例如有的是因赋税过高、有的是因粮食短缺；在这些大类之下，我们又可根据起义人数、是否拥有武器来进行细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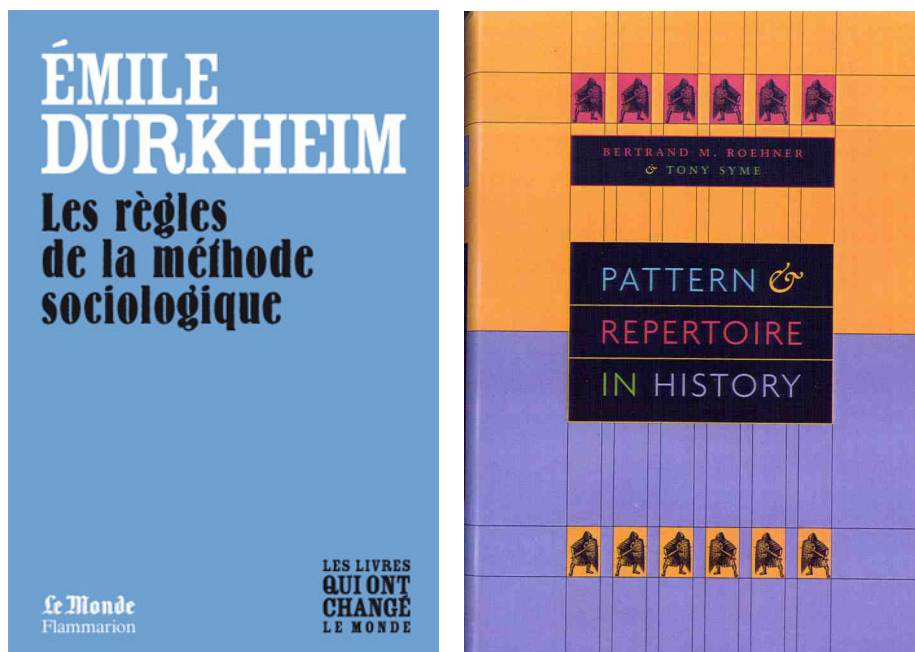


图 4: 两部作品, 一个主题。杜尔凯姆的著作于1894年出版, 其译名为《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社会学方法规范)》右边则是2002年出版的《Pattern and Repertoire in History(历史中的模式与行为策略集)》。尽管相隔一个多世纪, 两本书仍然有着同样的目的——那就是将社会学和历史学转变为可测试的科学。杜尔凯姆的书及其后续的关于自杀现象的研究(Durkheim 1897)阐释了如何通过类比“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s)将实验物理学的方法论应用于无法进行直接试验的领域。在《历史中的模式与行为策略集》一书中, 作者将杜尔凯姆的方法应用在了历史事件的研究上。附注: 两本书均有在线免费版本。

我们还是不妨举例来进行说明。第一步, 我们观察2000年法国未婚成年人的自杀率; 第二步, 将2000年的比率与1999年和2001年的加以比较, 观察这一现象是否能够重现。这一比率在随后的几年中确实保持平稳, 误差在 $\pm 5\%$ 以内; 接下来我们不妨改变家庭关系数量这一参数, 就会观察到没有孩子的已婚人士的自杀率是同年龄段未婚人士的 $1/2$ 到 $1/3$; 而在有孩子的家庭中, 自杀的发生率比在没有孩子的家庭中更低。换言之, 自杀率随着家庭关系数量的增加而降低。事实上, 这一结论不仅适用于法国,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是如此, 且这一结论有可靠的数据支持(Richmond et al. 2016)⁴。

不可否认, 上面所提及的案例仍是一个社会学而非历史学的例子, 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两个领域可以采用统一的标准和方法来进行研究。不过分离主义者的骚乱(separatist disturbances)恰好提供了一个与历史相关性更强的例证, 勒纳(Roehner)通过对一系列广泛的案例进行分析(Roehner 1997, 2002)后得出了

⁴本书中的参考文献均以“作者姓氏 年份”这样的格式出现, 在书后的参考文献列表中可根据作者姓氏的字母序索引找到相应的文献。

这样的结论：A国a地区分离主义者的暴力活动程度主要取决于两个变量：(1) a地区相对于A国的孤立程度，举例来说，a地区通常会A国与邻国接壤的边疆偏僻地区；(2) a地区在成为A国领土之前的自治程度及其自治状态在过去几个世纪内取得的接受度。第一个变量是地理因素，但第二个则是历史因素。换言之，研究这一问题的方法论和研究钟摆问题是一样的。勒纳在1997年发表的研究中分析了约40个相关案例，几乎所有的被研究案例都来自20世纪(Roehner 1997)。假如能够找到数据资料，那么通过加入几个世纪前那些更为久远的案例，就可能使那项研究的案例数达到现有的两倍或三倍。这也正是当更强大的望远镜让天体物理学家得以观测更遥远的星体时天体物理学家们在做的事情，而更遥远的距离也意味着我们看到的是星体更早期的状态。

我们刚刚提到的都是可变性比较小，而且有史可查的事件样本又很多的情况。这是最好但可能也是相当少见的情形，一般来说数据的获取都是主要的限制因素。

但是这种实践层面的障碍不构成对方法论本身的质疑。即使在没有那么多案例的时候，分类法也仍然是为先前一无所有的领域提供规则与模式的一种好方法。经过一段时间，分类可以不断被细化，正如《国际疾病分类》自20世纪初建立以来实现了显著的发展。

比较视角看世界之宣言

接下来的例子表明在人类事务中进行比较并不是自然而然的本能。将眼光停留于我们所处的小世界相比于放眼圈外要容易得多。

所有大城市都面对同样的问题：私家车与公共交通的矛盾、环境污染、无家可归的街头流浪者、垃圾分类处理，不一而足。一部分城市能够相当出色地解决这些问题，而另一部分却被问题压垮。

然而对于一个想要学会如何解决麻烦的城市，派一个代表团去与自己情形相似且成功城市学习其管理方法(同时也应该吸取其他城市的失败教训)，并将这些方法应用于自己的城市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方法。但事实上使用此法的城市并不多，这也表明接受比较的观念也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当然对于在其它地方适用的措施进行仔细检验是完全必要的，至少这样一个比较研究可以让人清楚认识到这些措施的运作生效是基于一系列的原因，而不是随意为之的产物，哪怕某一措施看似确实有效也一样如此。通过对比我们往往更能发现事物发展的内在科学规律，也只要如此才能在应用他城解决方案时不致东施效颦。

值得一提的是，现今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活动通过各类设备(例如手机、社交媒体、手环一类的运动设备、信用卡、公交卡等等)产生了海量的数据，这些大数据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城市更多的信息，得以让我们能够更量化地描述我们的城市、更加准确地把握城市的脉搏、挖掘城市中纷繁复杂现象背后的机理(Li 2017a)。类如我们通过大数据分析，就可以挖掘出城市中人类移动的模式，而基于这些我们可以进一步去定量地研究城市的交通效率(Dong 2016)、城市中人类活动对于空气质量的影响(Xu 2017)、流行病的传播预测(Li 2017b)等等。大数据让我们得以拥有更多的观测实例、使得我们所关心的相似事件的集合更加丰富，而这正是我们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基础。

期寄于中国历史悠久的仔细观察传统

我们过去数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本书所提出的方法最适合乐于集中精力、观察细节的人，这更多的是一种思维转变而非专业训练的问题。

中国古代对于超新星以及彗星的观测与记录要比西方开始的早很多而且精确很多⁵，而这显示出中国有着巧妙而细心的观察传统。我们为什么如此强调观察呢？很明显的一个原因是如果没有第谷·布拉赫的观测，就断不会有开普勒定律，更惶论牛顿的理论突破；在中国完成的首次荣获诺贝尔科学奖的研究⁶正是部分依赖于中国古代对多种化合物的作用及治疗效果的详尽描述。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进行的这一项目依赖的正是现代实验观测与过去积累的大量知识的结合。

诚然，传统中医药如今还在不断得到推广和运用，但在学术圈更多的还是追逐备受仰慕的美国大学和西方期刊所引导的趋势，这似乎与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精神一致，这一运动并非完全照抄国外，对于究竟从外国借鉴哪些事物表现地十分审慎。从提倡白话文(又称“现代文”)以取代过时僵化的八股文，到强调科学、推动妇女解放，这一运动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只是新文化运动与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5年“五卅运动”等反帝国主义运动杂糅在一起，这也使国人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动机缺乏充分了解，大多情况都是其反帝国主义的动机被过分强调，反而较少提及向西方学习的部分。但当年新文化运动也确实是杂糅着向西方学习、但同时又反对西方这样两种看似互相矛盾的情感⁷；图5中的两人就曾在其二十岁左右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并对新文化运动进行过深入解读。

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我们在本书中提出了可以科学分析历史事件的方法论，它着重于分析“小事件”而非“大事件”，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分析的(analytical)。另外由于我们研究的并非单一的事件，而是重多相似事件组成的集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一方法又是比较的(comparative)。当然我们应该承认分析、比较这两个概念仍然太过宽泛，我们所提出的方法或许叫作“比较历史分析”会更准确一些，但由于这个名字略为冗长粗笨，所以我们在书中会根据不同的侧重将这一方法(比较历史分析)在一些情形下称作“比较历史(comparative history)”，在另一些情况下或许又会唤作“分析历史(analytical history)”；但这两个概念本质上对应的都是“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 analytical history)”。发展比较历史分析学，需要仔细、严密地处理海量的历史数据，而在中国这一传统由来已久，正如睡美人一般，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唤醒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可以基于其自身的传统为新的研究方法提供肥沃的土壤，使之蓬勃生长并结出甜美的果实。

关于本书及其它

在本书中我们将采用相对自由的比较方法，而不会试图列出一张累人的类似事件清单。我们一般会将自己限制于2-3个事件的比较，例子虽然不多但也基本能

⁵参见英文维基百科文章“Historical comet observations in China(中国历史上对于彗星的观测)”

⁶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于1957年获诺贝尔奖时仍是中国公民，只是二人虽然也在中国接受过教育，但其研究工作(包括其博士阶段的研究)均在美国完成。

⁷二十世纪20年代发生在香港的反外暴动(anti-foreign riots)和对英货的抑制几乎让香港的贸易完全停摆。其实今日的中外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也仍是处于这样一种矛盾对立统一的状态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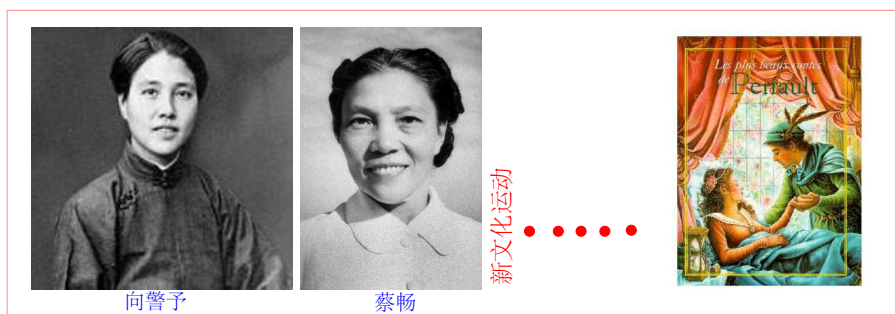


图 5: 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复兴。左: 向警予(1895-1928), 女, 1928年5月1日被国民党处决。中: 蔡畅(1900-1990), 女, 为新民学会(New People's Study Society)早期成员, 该学会由毛泽东于1918年4月在湖南建立。学会本身属于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部分, 促进了部分经审慎选择后的西方文化的传入。两人的经历都表明增加财富这一西方的关键目标完全不在其考虑之列。新文化运动的审慎选择性学习精神是否会如本图右侧《睡美人》的封面所示一般经历重生呢? (图片来源于网络)

将比较历史学的意味展现出来。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使这本书有趣而易懂。如果当读者欣喜地发现近日新闻头条上的事件实则可由耳熟能详的前人定义的模式为蓝本来进行解释, 这种满足和愉悦正是我们希望向读者报传递的。这种认知与意识这所以重要, 是因为这是预测事件可能如何展开的第一步。

如果有读者想要了解更加系统的大样本调查研究, 可以参阅本书著者之一(B.M.R.)发表于1997年的研究成果(Roehner 1997 a, b)。

比较历史学在中国的发展

我们已经强调过, 在西方除了像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这样的独立历史学家外, 很少有历史学家曾尝试比较研究方法。那么中国的比较历史学发展如何? 从某种意义上讲, 卡尔·马克思的哲学本可以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尽管马克思在多数情况下以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身份出现, 但在其为《纽约日报论坛(New York Daily Tribune)》所撰写的400篇作品中有很多文章都对不同地点发生的相似事件进行了比较。简言之, 他已经实现了比较研究学者(comparativist)思维上的转变。他关于雾月政变(coup of the 18th Brumaire)的著作也有着同样的倾向, 这些作品是否影响了某些中国历史学家呢? 只是恐怕我们已无从知晓。

中国有一位知名历史学家黄仁宇(Ray Huang), 其研究方法亦有些许比较研究方法的意味。黄仁宇在共产党胜利之后移民美国, 而在此之前他是一位国家主义者, 因而有人确信黄仁宇并未受到马克思的影响。有人将黄仁宇与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相比, 因为两人都尝试在一定距离上观察历史事件并集中观察主要过程;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正是为了更清晰地发现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 而且在其著作中他经常将东西方历史进程进行对比。换句话说, 二者都认定对于人类历史而言存在某些普遍适用的规律。黄仁

宇指出了在中国这些规律如何发生作用，但是并未尝试详细阐述这些规律在其它地方同样适用。简而言之，布罗代尔(Braudel 1967)和黄仁宇(Huang 1988)提出了一个概念性的框架，但这一框架需要通过日后的比较研究加以证实和测试。

毋庸赘言，如果目前中国大陆有比较历史学家，我们会很高兴与之会面相识。任何帮助我们与之取得联系的信息都极有价值，我们在此先行致谢。

官方历史、规范历史与事实历史

在结束前言之前，我们感觉有必要讨论一下事实历史(factual history)与规范历史(normative history)之间的区别。这两个概念是我们从经济学中借用来的，下面我们将首先介绍实证/事实经济学(positive/factual economics)与规范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这两个概念。

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 有时也被称作事实经济学)主要研究“(实际情况)是什么(what is)”；而规范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则是解释“应该是怎样(ought to be)”。

- 实证经济学式的论断很可能是这样：“2010年美国的收入差距要比法国的高”。
- 而规范经济学式的论断则可能是：“牛奶的价格必须要到3欧元一升才能让奶农有更高的生活标准”，或者“应当对CEO的收入进行一定的限制来保证收入差距处于可控状态”。

不过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前的区别也并非一直如此清晰分明，一个主要原因是除了一些大家公认的常识之外，很多论断中也会有些被隐含接受的、含有一定倾向性的假设。举例来说，我们通常认为较大的收入差距是比较小的收入差距更坏的情况(可能只有一些极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并不这么认为)。而这样的隐含倾向也会让实证经济学的一些论断部分地含有规范经济学特点，而且由于不平等性可以通常多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度量⁸，这就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换言之，即使对于同样的情形，也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衡量指标和解读方式，进而产生并不相同的结论。

但是无论进行这样的区分有多困难，我们仍应时刻留意实然事实与应然论断之间的区别；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将走入混乱和偏颇当中。

相较于经济学，实然与应然的区分在历史学中实际上更加重要。其中一个简单的原因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在记录本国历史时都会采取自己国家的视角，而这种视角本身就会让很多描述变得无法完全客观。例如对于同一段反殖民斗争的记录，同样的一支武装可能会被一方称作恐怖分子，而同时又被另一方称作自由斗士。明成祖朱棣1424年崩逝后谥号“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但他事实上与“纯仁”一词就相去甚远：他在位期间大兴文字狱、残害忠良，最为骇人听闻的便是腰斩方孝儒并诛杀其十族(共计873人，另有充军等罪者千余人)。而且在其逝后百年，明世宗于1538年改明成祖谥号为“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将体天与广运改为了启天与肇运，而这

⁸例如我们可以用前1%的人的收入占全部人口的总收入之比来衡量收入差距、也可以用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来进行衡量。

更凸显了明成祖所创下的功业的开创意义。从这一个例子我们就很容易窥见官方/规范历史与事实历史的区别了。

比较历史与事实历史之合璧

爱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社会学方法规则(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一书中强调应当用与物理学家研究自然现象相同的方式从“外部(from outside)”去研究社会现象。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告诫自己的学生没有任何化学家会说氧气是“好的”而氯气是“坏的”。但即使如此，他仍然很难让学生们不在自己的毕业论文中对某一事件进行好坏的评判；“过失”、“错误”、“罪行”、“复原(rehabilitation)”、“赔偿(reparation)”这一类词汇显然都属于规范历史学，很多时候都会让描述有失客观。

比较历史学则可以自然地为我们提供一个客观的视角。或许有人会谴责美国内战中有太多的人员伤亡，但通过比较历史学的方法研究众多内战之后，我们就可以马上发现所有的内战都是无情与残酷的，美国内战也并非特例。而且比较历史学重在揭示普遍的规律，或许在不同国家中相同的事件会有程度上的差异，但内在规律却往往是一致的。举例来说，制度腐败(institutional corruption)在西方也非常普遍，只是它被称作了“利益冲突(institutional corruption)”而已；而“折磨(torture)”则被称作“第三学位(审问)(third degree (interrogation))”。用词在很多情况下都非常重要，但他们所对应的却往往仍是同样的事实。

苏联领导人公布的对于斯大林成就的评估显然是规范历史学的论断；相似的，美国在每次战争或者对外占领之后，都会有为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工作的专业历史学家来给出一份官方历史档案。美国关于占领日本的历史记录有45卷之多，但尽管体量如此之大，在其官方档案中很多有关占领的事实都被故意忽略，因为这些事实与国务院想要给出的声明有所出入。

上述是典型的规范历史的例子，我们在本书中则力图局限于讨论事实历史；比较历史分析学视角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达成这一目标。